

无论对于交战双方的哪一方来说,1952年10月14日至11月25日都是一段血写的日子。朝鲜战场上在这一时期内流血最多的地方就是上甘岭地区。我方将这次交战行动称之为“上甘岭战役”,敌方则称之为“摊牌作战”或“狙击”棱线战斗。这场战役不光以惨烈而著称,而且极大影响了朝鲜战争的走向。从很大程度上来说,正是这次战役彻底打破了“联合国军”采取任何战役进攻行动以改变现有战线位置的希望(当然,这也是以他们再也不愿意承受这样的巨大损失为前提的)。对于这场战役,其过程已经广为人知,但有些问题即使是在国人心目中似乎仍然存在认识并不一致的地方。笔者希望这篇从若干侧面而不是战役全局角度描写这次战役的文章,能对读者起到一点抛砖引玉的作用。

战役还是战斗

对于我方而言,“上甘岭战役”这一称呼由来已久。但是,在敌方史料中却难以找到这样的称谓,他们多将这次作战行动称为“摊牌作战”或“狙击”棱线战斗。前者使人难以确定这次作战行动到底是一次战役还是一次战斗,后者则明确地认为是一次战斗。将这次作战称之为战役或战斗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意义却相差极大。战役可以对战争整体形势产生相当的影响,战斗则正好相反。这就涉及到了对于此次作战意义的认定问题。如果这种认识仅仅存在于当时的对手之中,那么还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今天的国人中也在这个问题上产生了模糊的认识,这就让人无法接受了。笔者打算首先就这个问题进行一个肤浅的探讨。

我们先来看看战役和战斗的定义。需要说明的是,在上甘岭战役发生的年代,我军正处于向苏军学习,推进正规化的时代。当时,我军的军事术语受到苏军军事理论的重大影响,甚至很多都是直接借鉴了苏军术语。因此,在阐述我军现在使用的术语含义之前,有必要先弄清当时苏军有关术语的含义。按照苏军的概念,战役是指:“武装力量的战役军团(战役—战略军团)的战斗行动样式,根据统一企图和计划,为解决战略任务、战役—战略任务或战役任务而



上甘岭战役的若干侧面(上)

★ 窦超

在战区或战略(战役)方向上实施的在目的、地点和时间上协调一致并相互联系的对战、战斗和突击的总和。按规模可以分为战略性战役、方面军(舰队、国土防空军区、集团军群)战役、集团军(军)战役、区舰队战役”。战斗则是指:“交战双方的兵团、部队、分队(飞机、舰艇)所进行的有组织的武装冲突,其目的在于歼灭、击溃和俘虏敌人,以及攻占或扼守重要地域(地区、目标)。战斗是夺取胜利的唯一手段。战斗的理论和实践属于战术范围”。从这个概念的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出,战役的规模和影响要远大于战斗。

我们再来看看当代我军对于战役和战斗的定义。我军现行军语中对于战役的定义是:“军团为达成战争的局部目的或全局性目的,在统一指挥下进行的由

一系列战斗组成的作战行动。按规模可分为集团军战役、方面军(集团军群)战役、战区战役等”。战斗则是指:“兵团或部队、分队在较短时间和较小空间内进行的有组织的作战行动。”这一描述与苏军概念相差不大,我军相关概念也表明了战役规模和影响要大大超过战斗。

如果从规模上来判断一次作战行动是否属于战役行动,就需要对参战力量的规模进行确认。这里有两个相对的概念:军团和兵团。除了细小的差别外,当时的苏军和我军都认为军团是指集团军及其以上的建制单位,兵团则是指师和军这两级建制单位。当然,这个认识实际上也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当时的集团军,也就是我军当时称为兵团的建制单位,多是下辖若干个军的建制单位,而现在我军的集团军除增加了更多的兵

上甘岭战役的若干侧面(上)

种部队外，基本上等同于原来的军，下辖若干个师或旅。如果单从规模上来看，可以这样认为：军团进行的作战就是战役，而兵团及以下进行的作战就是战斗。上甘岭战役期间，我军参战兵力为志愿军15军2个师（45师全部投入战斗，29师投入近2个团兵力）、12军2个师（31师除少数几个连外均投入战斗，34师只有106团的7个连投入战斗），折合后总兵力为3个多师4万余人。如果单从师的数量来看，与一个军相差不多。但是，志愿军2个军的指挥机构都带领部分所属部队投入了战斗——12军在其2个师参战后组成了五圣山作战指挥所，由副军长李德生统一指挥31师和34师的反击作战，并归15军军长秦基伟直接指挥。这就超过了单纯一个军参战的范畴而达到了军团级别。军被称为高级战术兵团，师被称为基本战术兵团，集团军则是基本战役军团，2个高级战术兵团的作战行动就达到了军团的规模。这就是说，我方一支军团规模的部队进行了这次作战，其被认定为战役也就具备了一个重要条件。除了上述实际投入作战的兵力，12军34师106团和100团曾作为该军31师的后续部队准备投入战斗（实际上只使用了106团的部分兵力）。此外，在战役结束阶段为准备作战行动继续下去，志愿军第3兵团（15军和12军均隶属于该兵团）经志愿军总部同意，曾决定抽调68军204师作为15军预备队，但没有赶上参加实际战斗。如果将这部分兵力加上的话，我军参战兵力应该就达到5个师的规模。

其次从时间上来看，从10月14日战役开始到11月25日战役结束，作战行动共持续43天。这一战役持续时间也得到了韩国方面战史的基本认同。韩国国防部战史编纂委员会编写的《朝鲜战争》一书认为战役从10月14日开始，11月24日结束。长达43天的作战行动，是难以被包括在一次战斗的范围之内的。

再从空间角度来看，虽然上甘岭战役是在一处只有3.7平方千米的区域内进行的，但是从交战一开始战役就分为2个明显不同的战役方向：一个是被敌方称为“三角山”的597.9高地，另一个是被敌方称为“狙击兵岭”或“狙击棱线”的537.7高地北山阵地。这两个战役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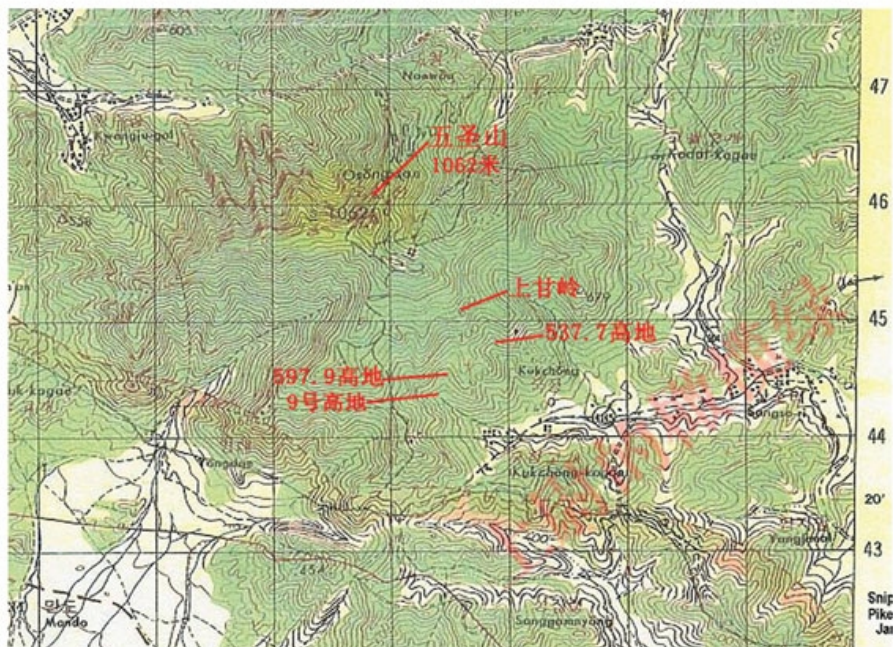
向在不同的战役阶段其作战行动并不同步。在10月30日开始的决定性反击中，虽然两处阵地同时布置了反击作战，但却将重点置于597.9高地。537.7高地北山的反击作战严重缺乏大口径火炮的支援，因此处于辅助地位，反击也没有成功。之后，在597.9高地进行反复争夺并最终巩固阵地的时候，只有29师87团在537.7高地北山坚守阵地，10天之后才由12军31师92团接替下去。直到11月11日，志愿军才开始对537.7高地北山进行决定性反击，并一直持续到战役结束才巩固下来。这种分阶段在不同战役方向上进行的作战行动，只有战役行动中才能以这样的规模出现，在战斗中是不可能。

最后从战役影响上来看，正如前面提到的那样，上甘岭战役彻底打破了“联合国军”采取任何战役进攻行动以改变现有战线位置的希望，证明了以坑道为骨干的我方防御工事的稳定性。这一影响无疑超出了局部范围，而具有了带有全局性影响的特征。也就是在这次战役之后，敌方再也没有发动一次战役规模的进攻行动，这就为我志愿军在1953年发动阵地战阶段规模空前的夏季反击作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尽管以后仍有美军将领不断提出各种不同的进攻作战方案，但无一不被否决，华盛顿方面已经无法承受像上甘岭战役那样惨重的损失。

基于以上理由，“上甘岭战役”这一称谓是当之无愧的，这充分体现了这场战役的规模特点和巨大影响。不过，事实上这个“战役”的称谓也不是一开始就有的。在战役开始的前20多天里，志愿军曾依照苏联的条令大纲内容（即上面所说的兵团以下规模作战称为“战斗”），将上甘岭地区的作战行动称为“597.9高地和537.7高地北山战斗”或“五圣山前沿两高地战斗”。直到12军参战后，作战已达到军团规模，志愿军总部才根据高地附近的上甘岭村村名，将作战行动改称“上甘岭战役”。这里需要提到的一点是，美国陆军官方战史《朝鲜战争中的美国陆军》第一卷《停战谈判的帐篷和战斗前线》（中译本）中将“摊牌作战”翻译为“‘摊牌’战役”似有疏忽之嫌。因为“战役”一词美军直到1982年版的《作战纲要》中才开始使用，而《停战谈判的帐篷和战斗前线》一书是根据1970年再版的版本翻译的。

战役初期我方极为被动的原因

上甘岭战役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争夺表面阵地阶段（10月14日—20日）、坚持坑道斗争阶段（10月21日—29日）、决定性反击阶段（10月30日—11月25日）。这三个阶段中，志愿军在前两个阶段事实上是处于一个相当被动的境地的。如果不是这样，就不会有一个长达9天



上甘岭地区地形图（美军）

的坚持坑道斗争阶段。这个阶段实际上利用坑道拖住进攻的敌军，然后在后方积蓄力量准备反攻。如果始终掌握了战场主动权，是不需要这么长时间进行反击准备的。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志愿军在战役前半段的被动局面呢？

在笔者看来，至少有3个因素造成了这一局面。首先，对敌军企图判断的失误。10月14日以前，有很多征候表明敌军可能会在上甘岭地区采取较大规模的进攻行动。在8月底、9月初，美军第8集团军司令范弗里特曾到与45师防御正面对峙的韩国第2师和美军第7师视察三次。此后，敌阵地内步兵就开始频繁活动，汽车运输活动增加以保障弹药物资储备，并于金化以北公路沿线终日不断释放烟雾掩护运输。在金化以南六丹里地区，我军多次发现敌军进行多兵种联合作战演习。敌军直升机对我前沿反复进行侦察，军官也抵近我前沿观察地形。自9月以来，敌方以小部队向我进行了5次试探性进攻，并在597.9高地连续捕捉我方3名哨兵。此外，原韩国第2师1个连防守的鸡雄山阵地由美军第7师31团接替，以作为其进攻依托。更为明显的是，10月5日，韩国第2师32团2营参谋李吉求向我军投诚，供出其所在部队将与美军配合向597.9高地和537.7高地北山发动进攻。有资料显示，另外还有一名韩国士兵向我军投诚，并提供了同样的情报。

当时，15军正在按照志愿军的统一部署进行秋季反击作战行动，准备以45师133团和134团各一部反击韩国军驻守的注字洞南山阵地。14日，按照预定计划步兵已经开始调整部署，炮兵已进入发射阵地，野炮和榴弹炮都已指向注字洞南山，师指挥所也已经前移，粮弹储备也已完成，一切准备即将就绪。15军得到上述情报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只是命令防守两个高地的135团做了一般性防御准备，而将主要精力仍然放在对注字洞南山的反击上面。敌军开始进攻后，我方还认为这是敌人在次要方向的配合行动，仍然不愿意放弃18日反击注字洞南山的计划，直到15日上级命令停止执行这一计划。这直接造成了我军对此次战役的准备不足（虽然反击注字洞南山的准备工作后来转用于上甘岭战役并起到了一定作用，但仍然是远

远不够的），例如战役第一天由于射界受到工事限制和来不及转移阵地，我方只有6门山炮、6门野炮和3门榴弹炮可以对我防御部队进行支援，难以遏制敌方的猛烈进攻。直到当晚，我方炮兵才调整部署后全部投入战斗。但初期我方炮火仍显不足，只是在战役过程中才逐渐得到加强。45师防守部队就是在这种缺乏准备的情况下与敌反复争夺，虽然给敌人以重大杀伤，但自身也损失惨重，争夺表面阵地7天后不得不全面退守坑道。

其次，对敌军以如此大规模、如此长时间地进攻缺乏认识。在上甘岭战役之后，曾有人说这场战役是“在小山头上打大仗”，这就说明了此次战役的激烈程度。然而，从一开始15军就没有进行这样规模和长时间激烈战斗的思想准备。15军军长秦基伟后来回忆说：“至于攻势重点，我们分析最大的可能在44师正面（平康方向），企图夺取西方山、斗流峰……战斗持续时间可达20天至一个月。我们估计敌人重点进攻五圣山的可能性较小，因为五圣山地势险峻，便于我军防守，如果敌人将攻势重点放在五圣山，就必须从日本调动力量，只凭在朝力量是不够的。而且，在五圣山这样的防御阵地上，我们也比较容易粉碎敌人的进攻……到了9月下旬，敌人在日本的部队尚无调动迹象，而我就在整个朝鲜战线上发动了一连串的战术反击，我们估计敌人大规模战役进攻的可能性不存在了……”

得到投诚的韩国军参谋提供的情报后，我军也认为进攻仅仅是为配合攻击西方山的小规模行动。这说明，当时15军认为即使有大规模进攻也应该是指向44师的防御正面而不是45师，45师正面至多会有一些配合行动，规模不会太大。此外，我方当时对敌军尤其是韩军边打边补充兵力的能力估计不足。韩国军不同于在异国境内作战的志愿军和美军，他们有经过一定训练的预备兵员和军官，可以源源不断地补充作战部队的缺额。战役开始时，韩国第2师有12000余人，战役过程中受到惨重损失，但经过不断补充到战役结束还有11000余人，基本上能够维持原有的建制单位（虽然新兵多了战斗力下降，但总比人越来越

少要强）。这样一来，形成了怎么打也不见敌人减少的局面，战役时间也就随之延长，我方困难也就相应增加了。

再者，我军在战役初期的战术运用上出现了失误。基于以上两个失误，顺理成章的结果是志愿军参战部队在战役初期没有打持久战的打算，也就导致了战术运用上的一些失误。秦基伟后来回忆说：“在战斗开始的第一周内，我虽伤亡大，但看到敌人伤亡更大，便认为敌人不久就要收兵。特别是当阵地被敌人占领后，脑子发热，想一巴掌把他打下去。所以我对崔建功师长讲了那样的话，打不下来就不要回来见我。我这句话放出去不要紧，下面脑子更热，一股血气上来就拼命，增大了伤亡。”战役第一阶段的7天时间内，白天敌军进攻占领表面阵地，我军就夜间反击，形成昼失夜反的局面。在7次反击中，3次全部恢复了阵地，4次部分恢复了阵地。虽然战果可观，但是在反击中我方用兵过多，第二梯队仓促投入战斗，增加了很多不必要的伤亡。7天中，45师投入战斗的兵力达到了21个连（占全部数量的77%还多），各连的伤亡都超过了半数，个别连队只剩下几个人。这样一来，45师也就丧失了继续组织较大反击的能力，只能通过第二阶段的坑道斗争拖住敌人来赢得反击的准备时间。发现这一问题后，在上级的及时提醒和对战场形势的清醒认识后，15军改变了原有的急躁情绪，采取稳妥的办法准备打持久战，这才改变了初期的战术错误。正如秦基伟所说的：“打了一阵，冷静下来一想，发觉不对，敌人拉的架势很大，不是一下就能收场的，要稳住阵脚，同敌人打持久战。”随着一系列的战术调整，志愿军逐渐适应了这种高强度的阵地攻防作战，最终取得了战役的胜利。

战役中武器装备的运用情况

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都是在武器装备处于巨大劣势的情况下作战的，上甘岭战役也不例外。战役中，我方主要是依靠步兵轻武器和炮兵火力与敌空地联合部队进行战斗，战役的胜利说明我军将这些武器的效能发挥到了一个极高的水平。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其中几种主要武器在上甘岭战役中的运

用情况。

当时，志愿军部队的主要武器装备除了部分留用的杂式武器外都已经改换成苏式装备。步兵轻武器以PPSH-41冲锋枪（国产型号为50式冲锋枪）、1944年式步骑枪、DP轻机枪和1943年式重机枪为主。PPSH-41冲锋枪是参战部队非常喜欢的枪械，其重量较轻，便于携带，容弹量较大，非常适合在反击作战中使用。战役中双方的炮火都非常猛烈，离己方稍远的目标都属于炮火攻击的目标，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压缩了双方步兵轻武器的开火距离。按照一般经验，我军抗击敌进攻时最有利的开火距离是20~30米，至多不超过50米。因为敌军是向上仰攻，前面一被打而停止后，后面拥上来就挤在一起，这样集中的目标对于冲锋枪来说更为有利。开火距离的缩短和敌军大量采取密集队形的攻击，使得冲锋枪更能在这种类型的战斗中发挥威力。据统计，45师被打坏的枪支中冲锋枪占到了70%之多。战斗中对射速的高要求，让1944年式步骑枪这样的非自动武器在上甘岭战役中根本找不到用武之地。尽管步骑枪和缴获的半自动步枪射程远、威力大，但却在以近战为主的作战环境中无法施展，结果成了几乎毫无用处的“鸡肋”。很多参加反击的战士宁肯不带枪只带手雷，也不愿意带派不上用场的步枪。但是，步枪在个别情况下如果运用得当也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如在战役第一天，597.9高地2号阵地的一支步枪发射100发子弹，毙伤敌30余人。当然，这是战役初期依托阵地防御时的战果，一旦开始反复争夺以近战为主后，步枪就难以发挥作用了。

DP轻机枪火力凶猛，但是弹盘体积庞大不便于携带，最要命的是弹盘与枪身结合的空隙过大，部队携带其运动时吱嘎作响，对于惯于夜间运动和作战的我军来说容易暴露目标。当然，在白天这种武器用于防御作战时，并不存在这个问题。轻机枪如能运用得当，亦能发挥很大作用，但志愿军在战后总结中认为对其运用不够有效。严重缺水的上甘岭阵地上根本不适于使用水冷式重机枪，人都没水喝哪还有水灌到枪里用，这种条件决定了志愿军装备的气冷式1943年式重机枪将发挥主要作用。重机枪因为位置相对固定，而敌方又有强大的火力，

因此必须有坚固工事作为依托才能长时间作战。10月14日当天，597.9高地主峰3号阵地的1挺重机枪（射手叫田立生）在暗火力点内一天发射弹药15000余发，毙伤敌达300余人。同时，597.9高地8号阵地内的1挺重机枪同样依托暗火力点，对向7号和11号阵地进攻的敌军进行侧射，也发射上万发子弹，起到了同样的作用。志愿军在战后总结中认为多展开机枪火力并发挥其作用是极重要的，但同时感到当时构筑的暗火力点过少，限制了机枪作用的发挥。

各种自动武器在高地上使用时必须注意防尘，否则很快就会因为被敌军炮火激起的灰尘阻塞枪机而无法正常射击——整个阵地上到处是被敌轰炸而成的深达1~2米的浮土。这种情况有时会导致自动武器使用频率的严重降低，如12军参战的第一个连队——31师91团8连4班参战时有6支冲锋枪，每支带500发子弹共3000发，战斗一天只打了30发子弹，主要原因就是枪机被灰尘堵塞打不了连发所致。结果，敌人一退到100米之外就能够重新整顿再次进攻，这个距离上手榴弹扔不到，对敌毫无威胁。因此，自动武器的防尘是其发挥作用的重要条件之一。电影《上甘岭》中就有我军进入阵地后，将覆盖在1943年式重机枪上的布掀开准备射击的镜头，这是当时所采取的措施的真实反映。

除了枪械，志愿军步兵使用最多的武器就是手榴弹、手雷和爆破筒。这三种武器之所以成为志愿军在抗击敌军进攻中的主要武器，其原因有三点：1、由于是山地作战，我军据守高处进行防御，这些投掷类武器能够很容易投到进攻的敌人头上，而进行仰攻的敌军却很难在挨炸的同时使用同类武器进行反击；2、为了避免自动武器无法连发的情况，使用投掷类武器更为保险；3、投掷类武器可以在不暴露身体的情况下就投出去，对于保存自己能够起到一定作用。这些原因使得投掷类武器在上甘岭战役中使用量极大。在自动枪械容易发生故障的情况下，手榴弹和反坦克手雷就成了志愿军坚守阵地时的重要武器。根据当时作战经验，以一个连100名投弹手为准，每人每日需手榴弹38枚、手雷2.4枚、爆破筒0.4根。而在10月31日一天的战

斗就消耗近3万枚手榴弹、手雷以及260根爆破筒。45师在上甘岭战役参战的23天里，消耗的手榴弹达到10.65万枚。很多部队上阵时将步枪改为徒手，专门携带投掷类武器。补充到部队的新兵进行战前应急训练时，也不教步枪的使用，而只教冲锋枪和投掷类武器的使用。由于阵地上覆盖了厚厚的浮土，手榴弹掉在土中爆炸难以发挥出有效的杀伤作用，后来战士们就采取拉弦后等1~2秒钟或在头上抡一圈再投出的办法，使手榴弹可以在进攻之敌的头顶上爆炸（即“空炸”方式），提高了手榴弹的杀伤威力。

12军31师91团8连进行作战准备时，除了携带部分轻机枪和冲锋枪外，其余徒手的战士每人带爆破筒、手雷各2个以及5千克炸药、6个手榴弹（临战时将炸药也换成了手雷和爆破筒）。这里说的就是苏制反坦克手雷，其爆炸威力相当强，炸出的弹坑直径达2~3米，深近1米。敌军一两个班或一个排冲上来，一个手雷就可以将其大部杀伤，要是炸地堡一枚也可以解决问题。但在战役初期手雷的数量相当少，前面的部队只好省着用，后来15军搜罗了3000枚手雷送上阵地，在反击阶段起到了很大作用。相对于手雷，爆破筒的威力更大，不是对付敌军半个连以上的攻击还舍不得用。后来为了提高爆破筒的投掷距离，还发明了将爆破筒置于挖空的树干中顺山坡滚下的方法，进一步提高了其杀伤力。投掷类武器在战役中所发挥的作用确实是惊人的，怪不得有人说上甘岭战役的胜利几乎就是手榴弹的胜利。

1952年，志愿军的炮兵火力已经得到了很大加强，其在上甘岭战役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如果说抗美援朝战争是我军由枪战向炮战过渡阶段的话，那么上甘岭战役无疑在其中起到了相当的推动作用。据统计，上甘岭战役中我军杀伤敌军人数中的约70%是炮火造成的。战役中，我军炮火的增强也存在一个过程。战役开始阶段，我军只有山、野、榴炮43门和“喀秋莎”火箭炮24门，相当于敌军炮兵火力的十分之一。在战役过程中，我军不断增加炮兵火力，参战火炮增加到山、野、榴炮133门，火箭炮24门，高射炮47门和迫击炮292门，发射炮弹达35万余发。炮兵火力的

基于——山、野、榴炮最主要的任务是在我阵地前 300 ~ 500 米的距离上构成“火墙”，打击敌冲锋、运动、集结的步兵，这也是能给敌军以最大程度杀伤的方式。其次的任务才是压制敌军炮兵。对敌炮兵的压制虽然是我军炮兵的次要任务，但却能起到大幅降低敌炮兵威胁的作用。如 10 月 17 日 18 时，我军炮兵对敌军位于住罗峙和松洞的 2 处炮兵阵地进行火力急袭，一举摧毁敌榴弹炮 21 门。

在指挥方式上，我军炮兵数量较少时，采取白天分割指挥，将火炮下放一部分给步兵团指挥，以及时支援步兵击退敌军进攻，到了夜晚再由师统一指挥支援步兵进行反击作战。我军炮兵数量增多后，就将一部分火炮固定分配给各步兵团直接协同步兵作战，师则控制三分之二以上火炮进行机动支援。后来，以炮兵第 7 师师长颜伏、45 师副师长唐万成等人组成炮兵指挥所，统一指挥 5 个炮兵群和“喀秋莎”火箭炮团，迫击炮和无坐力炮等随伴火炮则由步兵团、营直接指挥。各级分别在各个制高点上开设观察所，及时发现目标引导炮火攻击。对我军阵地进行了统一编号，对敌军目标统一制订了代号，使步兵对炮火的引导准确及时。在各种火炮的分工上：迫击炮不参加反击时的炮火准备，集中使用，用于形成“火墙”、打击进攻的敌步兵和死角内的敌军增援部队，对坑道口进行监视射击以保护我坑道口；无坐力炮用于对敌军表面阵地进行破坏射击，有时也可以用于对敌军封锁我坑道口的工事进行直接瞄准射击；山、野、榴炮和火箭炮用于进行反击前的炮火准备，进行摧毁和破坏射击，消灭集结的敌第二梯队，压制敌军炮兵等；高射炮除负责我军重要目标的对空安全外，着重打击敌军炮兵校射机，以减弱敌炮火威胁。

战役中，我军炮兵的运用方式得到了极大丰富。如在决定性反击阶段，我炮兵曾 6 次集中射击敌第二梯队，其中一次歼敌 100 余人，5 次使敌 2 个营又 7 个连丧失战斗力而未能及时投入进攻。在 10 月 30 日反击 597.9 高地时，我炮兵采用炮火假延伸，给敌军造成严重伤亡，支援步兵反击成功。11 月 11 日反击 537.7 高地北山时，突然集中火力压制敌炮兵并对阵地上敌军进行火力急袭，使



上甘岭地区美军指挥部



志愿军装备的苏制气冷式 1943 年式重机枪



志愿军炮兵装备的苏制 BM-13 “喀秋莎”火箭炮向敌方倾斜弹雨

敌炮兵 2 个小时没能开炮，敌军阵地上只有 1 挺机枪能够射击，我军步兵迅速恢复了阵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军迫击炮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我军分属 2 个团的迫击炮群可集中于一个方向使用，每炮每分钟发射 30 发炮弹，在一分钟集火射击下就可发射炮弹 600 发，对于工事不够坚固和密集冲击的敌人的破坏与杀伤最为有效。参战部队都感觉迫击炮是“宝贝”，但数量太少，特别是

没有重迫击炮，对远距离山地死角处的敌军难以消灭。虽然参战部队伤亡都很大，但 45 师参战的 3 个迫击炮连却因为阵地选择和伪装良好伤亡很小，因此能够一直坚持作战到战役结束。3 个连的 40 门迫击炮除被炸坏 4 门，自然损坏 4 门外，其余火炮都坚持到了战役结束。

(未完待续)

(编辑/弓鸣)



上甘岭战役的若干侧面（下）

★ 窦超

12军参战情况和作用

只要熟悉上甘岭战役的人都知道，这次战役是志愿军15军和12军打的。但是，在各种宣传中却出现了这样的一种情况：15军成了战役的绝对“主角”，同样发挥了重大作用的12军却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上甘岭战役成就了15军，这个军的官兵们自认是与38军同为朝鲜战场上功绩最大的部队。当时，15军防御正面的右侧友邻部队就是38军，双方碰面后相互问是哪个部队的？38军的兵说：“万岁军的，你们呢？”15军的人据此后来就自认为是“九千岁军”，俨然就是“志愿军第二”的口气。与45师一样将所属3个团全部投入战斗的31师（上甘岭战役参战的志愿军部队中只有这2个师投入了全部3个团的兵力）副师长李长林后来也遇到了让人“窝火”的事：李长林与34师师长尤太忠在重庆住学时，与45师副师长唐万成一个班，经常有人

请唐去作报告，但却没有人找同是参加上甘岭战役的李长林和尤太忠。秦基伟在昆明军区司令员任上时曾对这个问题说过一句言简意赅的话：“12军有意见。”到底是被忽略了还是本没有起到值得一提的作用，这就牵扯到了12军到底在上甘岭战役中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这是搞清这一问题的关键。

首先，我们来看看12军投入作战时的背景。当时，已经在上甘岭作战23天的15军45师遭受惨重损失。全师27个步兵连有16个打光2次后重建，134团8连打光3次后重建，伤亡人数达5600余人。29师参战的2个团部队也伤亡很大。由于我军是在异国作战，兵员补充比较困难，如果再由这些已经残破的部队继续打下去，那么就很难达到与敌争夺到底的目标。而15军44师因负责平康方向的防御任务而不能动用，29师85团处于防御第一线阵地也无法调动，可以说单凭15军已经无法继续坚持战斗下

去。早在10月20日，预见到此次战役有长期争夺可能性的志愿军总部就指定刚从15军左翼换防下来的12军担任此次战役的战役预备队。12军随即抽调6个主力团陆续开赴上甘岭地区，后来有4个团实际投入作战。可以这样说，12军正是在15军力量不足以与敌继续作战的关键时刻投入作战的。这一点得到了15军军长秦基伟的赞同，后来他在不同历史时期曾经这样说过：“12军是取得上甘岭作战全部胜利的保证。12军是在什么情况下投入战斗的呢？是当战斗最紧张、最艰苦，军二梯队已无法战斗时，赶来参战的”，“要充分肯定12军的作用。没有12军的参战，当时的这个客观情况，要是只靠15军，很难把它打成最后这么个结局的”。45师在11月5日退出战斗，而在这之前的11月1日，12军31师91团就投入了597.9高地的作战。如果这样算起来，12军部队在43天的上甘岭战役中打了25天（有一段时间是与15军部

上甘岭战役的若干侧面（下）

队共同作战)。由此可见,12军并不是像一些人说的那样去“收摊子,扫尾子”,其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从具体的作战行动来看,自11月1日起,31师91团就接替了597.9高地主峰阵地和主峰前方、西北6个阵地,只有主峰东北的3个阵地还由15军45师134团和29师86团各一部坚守。继45师于5日退出战斗后,29师部队也于次日退出战斗,597.9高地全部防务由31师接替。也就是在这一天,敌军完全放弃了对597.9高地的进攻,阵地得到了彻底巩固。虽然15军部队自始至终参加了597.9高地的战斗,但是最后巩固阵地的任务却是与12军91团共同完成的,这一点是应该得到承认的。此后,当战役焦点集中到537.7高地北山的争夺时,12军决定以31师91团和93团一部坚守597.9高地,集中92团和93团主力恢复仍被韩军占据表面阵地的537.7高地北山阵地(该阵地坑道此时仍由29师部队坚守,因无法撤下而未随主力退出战斗)。之所以在10月30日大反击中未能恢复537.7高地北山表面阵地,一方面是因为反击重点是597.9高地,另一方面则是因为537.7高地北山的地形情况极为不利。

537.7高地北山阵地非常狭窄且孤立突出,加上地势较低,因而受到注字洞南山、537.7高地南山主峰和597.9高地东侧11号阵地三面火力威胁,加上该阵地为土质构造,坑道抗弹能力较差,因此反击和坚守的难度极大。11月11日,12军以92团3个连反击537.7高地北山阵地,同时以93团不到2个排的兵力反击597.9高地东侧的11号阵地,一举将上述阵地恢复并将29师部队替换下去。92团在537.7高地北山与敌反复争夺战至17日,由12军34师106团接替。106团边抗击敌反扑,边在阵地上抢修工事,战至25日最终粉碎了敌军的进攻,将阵地巩固下来。11月28日和12月15日,91团和106团分别将2个高地移交给15军部队接防。此时,537.7高地北山阵地上的坑道工事已经可以容纳1个营的兵力和团以下随伴火炮了。应该说,537.7高地北山阵地是由12军部队反击并最后巩固下来的。12军部队上去后就把15军部队换了下来,后来的战斗都是前者打的,这一点也是得到15军军长秦基伟的认可:“92团、93团对537.7北山反击,夺回了表面阵地,改变了537.7北山的斗争形势,由被动转为主动。92团打得漂亮,一上去就恢复了阵地。后又经92团、106团努力,主要阵地我们都控制了。”



志愿军战士发挥近战夜战的特长

这里强调12军的作用并没有贬低15军的意思,相反,笔者还要指出12军从始至终都是置于15军指挥之下进行作战的。这是因为志愿军第3兵团在11月5日《对597.9高地及537.7北山作战部署》中是这样规定的:“为便于指挥,决定组织五圣山作战指挥所,由12军副军长李德生同志负责,统一指挥31师和34师之反击作战,29师之配合动作(31师、34师担任反击,29师担任防御),该指挥所归15军军长秦基伟直接指挥。”而且,12军参战部队是由副军长李德生指挥,而不是由军长曾绍山指挥,从级别上说也低于15军指挥员。这就说明12军自始至终都是处于15军指挥之下进行这次战役的,说12军部队配属给15军也是站得住脚的。而且,45师退出战斗时,其炮兵部队并没有随部队退出战斗,而是留在原地继续作战。45师的师团指挥、通讯、观察及后勤保障机构也暂时留在原地保障31师作战,直到31师的相关机构完善后才逐步撤出。鉴于这些原因,应该说15军在上甘岭战役中起到了主要作用,12军起到了重要作用并在战役第三阶段后半段起到了主要作用。

说起12军,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提一下,就是最后巩固537.7高地北山的12军34师106团的番号问题。这个106团原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12军36师,入朝作战前调入12军34师。有些战史资料中将该团番号称为102团,而有些资料则称为106团,这就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混乱。经过查证,在上甘岭战役期间该团仍使用隶属于36师时的番号,即106团;到了战役结束后才奉志愿军总部的命令,将番号改为102团,实际上顶替了调出的原102团的番号。因此,在上甘岭战役参战部队中并不存在102团这个番号,而应该是106团。当然,因为该团在战役结束后不久的12月16日就更改了番号,以至于在当年的一些战史资料中出现102团的番号也是情有可原的。

45师是否退出第一线阵地

韩国国防部战史编纂委员会编写的《朝鲜战争》一书中,对于上甘岭战役中我志愿军唯一整建制参战的师——15军45师在战役结束后的去向有这样一段话:“最初参加本战斗的中共军第45师(崔建功)遭受致命打击后,直到战争结束,再也没有在第一线露面”。然而,这一情况是否属实呢?

经过查阅相关资料,在战役结束的当天,也就是11月25日,韩国第2师南撤退出战斗进行整补,由第9师接替防务。自此,韩国军停止了对537.7高地北山的反扑。同一天,志愿军第3兵团决定:15军29师和45师于28日至12月上旬接替上甘岭地区的12军防务,12军参战部队交防后如情况无大的变化即归建休整。12月10日至15日,45师133团配属部分师直属分队和134团、135团各一部重返阵地,接替了537.7高地北山和牙沈里、忠贤山一线防务。45师虽然没有全部

再次开上一线阵地，但是其所属的一个整团加上其他2个团的部分部队再次重返一线却是事实，并且仍旧返回了经激战巩固下来的537.7高地北山阵地。如果从技术角度讲，可能是韩国军没有发现这次换防行动（换防不久，15军就开往东海岸执行海岸防御任务，离开了这一地区）。由此可见，其侦察和情报工作并没有有些人想象的那样准确。要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恐怕就只能解释为韩国方面刻意通过这样的虚假事实来夸大其战果罢了。

同样的问题还出现在对于我方的损失估计上。《朝鲜战争》一书中还引用了一本由黄振遐（此人可能是指我国作家黄震遐，他曾任上海《大晚报》记者和《新疆日报》社社长，提倡民族主义文学，1949年前往香港，曾任美国兰德公司顾问，1974年在香港九龙病逝）编著的名叫《中共军人志》中的一段话：“上甘岭战斗中，损失了3个师的兵力”。这段话据说是出自回国后的秦基伟之口，以此表明其战果之大，而我们却无法从任何一本中方资料中找到这样的说法。如果这种说法属实的话，那么实际参战的志愿军3个多师的兵力恐怕就只能剩下个零头了。我们从常理来推测的话，这种说法也是站不住脚的。一个上万人的师里，能拿起步枪参加一线战斗的人员不过六七千人甚至更少，而遭受伤亡最大的也就是这些人员（当然，由于敌方空中及地面炮火猛烈，我后方人员也有相当伤亡，但比例仍大大低于一线战斗人员），其余都是各级指挥人员、机关后勤人员等等。如果一个师的战斗兵员伤亡超过3000，也就是说占全部人员的三分之一左右，就会基本丧失战斗力。即使经过采取编并有关单位、补充新兵和抽调机关后勤人员补充战斗部队等措施，也难以恢复到以前的战斗力水平，伤亡如果再继续增加就只能退出战斗进行整补（上甘岭战役中的45师就是这样）。如果损失3个师的兵力，那就是3万多人，即使减去补充新兵的因素至少也会有2万多人，这些人员几乎占到了志愿军参战兵力的一半以上。如果真是如此，那么志愿军只有把参战的3个多师全部撤出战斗，由其他部队来接替才可能继续守住现有战线。而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因此，上面的这种说法是难以让人信服的。

其他方向的配合作战

上甘岭战役开始于我军1952年秋季战术反击作战正在进行之时。当时，处于被动地位的“联合国军”颇有些想在上甘岭地区“还一下手”的味道。也正因为如此，上甘岭战役也就不是一个孤立的战役，握有战场主动权的我军在其他方向上进行了相当规模的配合作战，对于战役胜利起到了重要的支援作用。

1952年秋季战术反击是从10月6日晚统一开始的，原计划进行到10月22日即停止反击转入正常防御作战态势。但上甘岭战役的争夺日趋激烈，志愿军总部决定将战术反击延续到10月底结束。从10月23日开始到31日，志愿军投入包括15军和12军在内的6个军兵力对20个目标进行了反击作战。其中，刚刚结束394.8高地（即韩国所说的“白马山”）争夺战的15军左侧友邻部队38军也对198.3高地进行了反击，除了个别目标反击未成功外，大部分目标都被攻克，全歼守敌。

这些反击作战中，对上甘岭战役起到直接支援作用的除38军和12军外，15军在平康方向上的反击作战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在该方向上作战的是15军44师和29师85团，最主要的作战行动是进行391高地争夺战（29师87团最先参加了这次战斗，后调往



在坑道口准备出击的志愿军战士

上甘岭参战）。10月12日，87团3营2个连400余人采取阵前潜伏的战术手段一举夺取了391高地（著名战斗英雄邱少云就牺牲在这次战斗中）。之后，87团与敌反复争夺12天，将阵地交给44师132团防守。132团战至11月29日，最终巩固占领了391高地，此战共歼敌2700余人，有力配合了45师方向作战。44师还对381高地东北无名高地进行了2次反击，虽未能巩固占领之，但也起到了一定的牵制作用。

44师方向的强有力配合作战，使得美军防御持续吃紧。美军从上甘岭地区撤出战斗的第7师未经休整就赶往铁原布防。美军还被迫从上甘岭地区调走5个炮兵营用于对44师方向的防御，这就大大减轻了45师方向的压力。从这里可以看出，上甘岭战役不仅仅是战役本身参战部队的胜利，也是全部志愿军部队共同努力的结果；不仅是前方作战部队的胜利，同时也是后方后勤保障部队的胜利。

一个本不是问题的问题

上甘岭战役的胜负应该不存在争议，这在以前是中外双方所公认的。但在有“韩国第一名将”之称的白善烨回忆录出版后，却又出现了另一个说法。2010年，韩国《中央日报》连载的《白善烨将军韩国战争回忆录》中对上甘岭战役有这样一段表述：“关于狙击岭（本文作者注：即前面提到的被敌方称为‘狙击兵岭’或‘狙击棱线’的537.7高地北山阵地）战斗，我还有一些话要说。中国把这场发生在韩半岛的战斗称为‘上甘岭战役’，还把对抗美国、援助朝鲜的参战叫做‘抗美援朝’。而这场‘上甘岭战役’也被中国称为韩半岛参战中最大的胜仗来广为宣传。我很不

理解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们不仅输了一场仗，牺牲人数也高达我军的两倍。可能是因为中共军最终在停战之前占据了这一高地，所以才这么写的吧。但事实上，真正的输赢一目了然。1952年晚秋打响的狙击岭战斗中，中共军惨败而退，将高地拱手让与我军。我们无法知道中国为什么要将这么明显的败仗说成胜仗，我想这可能是一种自我宣传吧。”

抛开其对于双方伤亡人数的说法，至少有2处不符合史实之处：首先，进攻537.7高地北山与进攻597.9高地的作战行动同属于“摊牌作战”，是一个整体，而不是单独的作战行动。白将军将537.7高地北山战斗单独提出来无疑是片面的，这忽略了同属于一次作战行动的597.9高地战斗，而这个高地最后全部为我军收复。其次，即使在韩国编著的《朝鲜战争》中也承认其军队只占领了537.7高地北山阵地的主峰A高地和“岩石”棱线，未能夺取Y高地（《朝鲜战争》第四卷356页）。而在我军战史记录中有这样记载：至11月25日，106团牢牢控制了537.7高地北山主峰及东北山腿北侧阵地，靠近敌军阵地100多米前沿2个班的山腿阵地为敌军所占据。综合各方面资料，可以这样认为：战役结束时，韩国军确实占领了537.7高地北山的2处阵地。至于这2处阵地的大小，韩国方面没有表述清楚。这同时说明，白将军在回忆录中所说的“1952年晚秋打响的狙击岭战斗中，中共军惨败而退，将高地拱手让与我军”这样的说法根本就不符合事实。白将军的这种做法明显带有偷换概念的特点，以偏概全，否认事实，进而否定作战的失败。不知是不是因为长达60年的漫长岁月让将军的记忆力产生了问题。

至于敌方伤亡人数的表述，用句俗话说就是“人嘴两张皮”，说多少就是多少了。对此，笔者曾在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回忆录——《我的前半生》中看到过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当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听到我军歼灭多少多少敌军的战报时，原伪满洲国的那些所谓“军事专家”告诉溥仪，军队伤亡人数是可以造假的。因此，溥仪也对战报并不相信。等到志愿军攻占平壤和汉城的消息传来后，这些“军事专家”才认为战报内容是可信的。因为伤亡人数可以造假，占领某个地区

却不能长期隐瞒，溥仪这才相信志愿军在朝鲜取得了胜利。伤亡人数尤其是敌军伤亡人数在很大程度上是估计出来的，特别是在远射程武器充斥战场的时代中更是这样。从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伤亡的原因来看，敌军飞机造成的伤亡占7%~8%，火炮造成的伤亡则为70%~80%，两者合计高达77%~88%。这样的比例决定了其对志愿军伤亡人数的统计必然要以估计为主，因为你根本无法准确搞明白对方在炮击和轰炸中到底死伤了多少人（美军飞机的战果统计中居然能将杀伤人员的数量精确到个位数），除非你随即就攻占火炮和飞机攻击的地区并进行准确统计。白将军所说的“牺牲人数也高达我军的两倍”是否准确也就需要打上一个问号了。

即使伤亡人数较多甚至差距很大的一方，也并不一定就是失败的一方，这就涉及到了战斗胜负评价标准的问题。作战目标没有达到就意味着这次战斗失败了，即使你伤亡较小也是一样。当年苏德战场上，苏军伤亡要远高于德军，但没有人会认为德军取得了战争的胜利。“联合国军”打算以5天时间和200人的伤亡为代价攻占597.9高地和537.7高地北山阵地，然而付出了即使按他们的统计也高达9000人的伤亡，打了40多天也只占领了537.7高地北山一小部分阵地，597.9高地则寸土未得。这样的结果要想称为胜利恐怕不是合乎情理的事。极力主张进行这次作战的范弗里特也因为这次战役走了背字——就在战役在“联合国军”看来打成“僵局”的11月9日，美国陆军部新闻发言人宣布：范弗里特将于次年1月24日退役。这不正是表明了美国对于此次战役胜负的态度吗？试想，哪个疯子敢在一个将军正取得节节胜利的时候想到去宣布他退役的消息。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美军和韩国方面资料对于此次战役的评价。韩国《朝鲜战争》一书中这样评价：“第2师和美7师从10月14日发起的‘狙击’棱线和‘三角’高地进攻作战，与所预料的相反，经42天迟滞不进的战斗，于11月25日夺占‘狙击’棱线而了之（本文作者注：此处与该书第356页的叙述相矛盾）……进入12月，随着寒流袭击，双方重又进入胶着状态，但在整个冬季，无论

防御或进攻，主动权均被以优势兵力为后盾的敌人所夺去。……当面之敌中共军第15军防御意志坚定，因而‘三角’高地战况始终没有进展，反而足以使敌人为打成漂亮仗而自豪。”《朝鲜战争中的美国陆军》一书则认为：“‘摊牌’行动得到了一个令人嘲讽的结局……6个星期的艰苦奋战过去了，联合国军司令部所属部队控制了狙击岭的一部分，但失去了整个‘三角山’……‘三角山’之战，中国军队以他们不屈不挠的斗争扭转了白马山之战的败局，挽回了面子，并且迫使联合国军停止进攻。”

当时，美联社从朝鲜发出的报道称：“联军的军官们预算这是一次激烈但是典型的有限山头攻击。而这次战役实际上却变成了朝鲜战争中的凡尔登”。“联合国军”最后一任司令克拉克在其回忆录中说：“我们死伤人数达8000人以上，大部分为大韩民国之官兵……我认为这次作战是失败的。”说到这里，大概每一个读者都能得出自己的结论，那就是我军取得了上甘岭战役胜利的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这并不会因为某一个人的几句话而改变。

韩国军对作战情况的几个总结

相对于特别重视此次战役对战争全局影响的中国而言，“联合国军”方面对作战情况的总结侧重于战术层次和角度。不过，对这些总结有个清醒的认识，对于我们更全面地理解上甘岭战役无疑也是非常有益的。

前面已经提到，韩国军由于是在本土作战，兵员补充非常方便，但在实际操作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集中在新补充的官兵与具有丰富实战经验的所在部队老兵之间，无法形成有效的整体战斗力。韩国军方后来讨论新兵补充问题时有这样的表述：从兵力运用的统计看，战斗期间两个团的兵力损失为4829人，补充3972人（官104人，兵3868人），这意味着一半以上为新兵。不同的韩军参战者对这一问题做了几乎一致的回忆：“这场战斗持续时间长，大部分是新兵，感到老兵宝贵”；“我带全营在A高地激战5天。4个连长全部受伤，损失大部分兵力，后来不得不带领从不认识的新排长和新兵打仗。从A高地撤退的

那一天，我亲自上第一线收容兵力，只收容到1个连的兵力”；“在发起第4次进攻时，我看了看全排，熟人很少，大多数是新兵。我下命令冲击，他们怕得不敢动，只好我率先冲锋带动他们。有一次，在A高地从天黑打到第二天3时，最后只有5人在坚持战斗，新兵全不见了。十个新兵不如一个老兵，这是我的切身体会”；“从战斗打响后第2周开始，新兵比老兵多，打起仗来看老兵眼色，战斗一激烈就往老兵位置拥挤，指挥员也不认识自己的兵，增加了很大困难”。韩军认为，不应该单纯以兵员的数量作为衡量战斗力的标准，应该加强新兵训练以使其拥有一定的作战能力后再补充到部队内，这样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美军方面也存在类似的问题，不少部队得不到士兵的补充，只好拿韩国兵来充数，这对部队战斗力也有一定负面影响。

对于志愿军在上甘岭战役中所依托的最主要工事——坑道，“联合国军”方面很少具体提到。在韩国《朝鲜战争》一书中仅有这样一段话：“敌人在‘岩石’棱线北斜面挖了可容1个连兵力的坑道，一旦受到炮击或轰炸，就进坑道隐蔽，过后出来战斗，因此我们挨打。我在审讯俘虏时得到这一情报后，带几名老侦察兵亲自去侦察，发现果然如此。之后，我们采取措施对付敌人的坑道战，但不易炸掉它，吃了不少苦头。”从我军的实战经验来看，韩国军在对我军坑道的围攻中表现得更为凶狠、毒辣。但是，这段表述充分表明了韩国军对于我方坑道无计可施的窘境。

由于双方的猛烈炮击和轰炸，2个高地表面全被炸成浮土，根本无法构筑工事。韩国军从11月9日起开始修筑汽油桶阵地，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一问题。这个方法是韩国第2师17团5连连长金宰东发明的，具体构筑方法是：将汽油桶的一面挖开射击孔，将另一面的铁皮去掉，然后将汽油桶立放在地上，让去掉铁皮的一端与交通壕连接，最后用沙袋堆在射击孔周围，人员就可以站在后面进行跪姿射击。韩国军认为汽油桶阵地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为减少伤亡做出了很大贡献”。物资匮乏的志愿军没有那么多汽油桶可以利用，只好由后方运送大量麻袋装土后堆成工事作战。

在战术运用方面，韩国军极度依赖美军空中及炮兵火力支援。其总结中提到了这样的战术防御手段：“防御时要以据点式配置诱敌，主要以炮兵和航空火力击退敌人。美军顾问协助得好，强击机也随时提供支援。”这正好印证了韩国人金阳明所著的《韩国战争史》一书中关于韩国军坑道作战失败原因时所总结的这一条：士兵掩蔽在坑道里不想开枪打仗。实战证明，只要志愿军能够保存一定的有生力量冲上阵地，那么攻下阵地就有极大的把握。这一方面是志愿军步兵的战斗能力远强于对手，另一方面就是韩国军只知道躲在工事内消极作战，将主动权拱手让给我军。对于炮兵火力，韩国军认为战役中“只重视交战地点的火力支援，没有压制敌人炮兵”。这实际上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上甘岭战役中我军炮兵压制敌军炮兵时取得的成功。

美军退出战斗引起的“风波”

众所周知，“联合国军”最初认为只使用美7师和韩2师2个营就可以圆满完成攻占2个高地的任务，并且只需5天时间和付出不超过200人的伤亡代价。但是，打了十几天后志愿军仍然进行着顽强抵抗。这个时候美军撑不住了，率先退出战斗，在韩国军中引起了不小的“风波”。

战役打响后一直到10月25日，双方仍在几个山峰上进行拉锯战。这时，美军第7师9个步兵营中的8个参加了这场为期12天的战斗，死伤人数达2000人之多。也就在25日这一天，美军第7师退出了战斗，将597.9高地的进攻任务移交给了韩军。这样一来，韩国第2师不但要担负对537.7高地北山的进攻任务，而且还要担负对597.9高地的进攻任务。美军遭到重大伤亡后以韩军来替换，立即在韩国部队中引起轩然大波。韩国战史中这样记载，“美军7师同第2师并肩作战，进攻并占领‘三角’高地。然而因敌顽强反击，截止25日的12天内，先后投入9个营作战，伤亡2000多人，战斗演变成持久战，因而将美7师防线交给了韩第2师。结果，第2师单独担负了中部前线要地的进攻。当时军团（本文作者注：指美军第9军）的这一措施立即激起舆论，给人一种只顾减少美军

伤亡的印象……第2师以不惜牺牲自己代价坚守要地的决心采取了上述对策（本文作者注：指接受美军第7师进攻任务的部署调整）。”虽然有后面的豪言壮语，但韩国第2师内部大骂美军让他们当“替死鬼”的人肯定不是少数。当时任韩国第2师师长的丁一权在1976年回忆，于11月1日接替其师长职务的姜文奉曾说：“那本来是预定由美第7师担任的进攻任务。可是，它每天付出200多人的伤亡也夺不回来，受到报纸的抨击。因此，把此项任务交给了我师。换句话说，是叫我们当美国兵的替身。所以在接受换班命令时，我就感到美国人、韩国人同样都是人，这不是叫我们替他们牺牲吗？”对此，《朝鲜战争中的美国陆军》却只用了一句话轻描淡写地一带而过：“当韩军第2师受命去攻打‘三角山’之际，它仍然没有摆脱狙击岭的战斗”。看来，无论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当“小跟班”的滋味总是让人不那么舒服的。

关于丢掉的2个阵地

这里首先要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上甘岭战役结束时是否像一些资料中所说的那样“寸土未失”。根据众多的原始资料和一些严谨战史资料的记载，上甘岭战役结束时，我军确实有2个阵地没有收复，仍然控制在韩国军手中。我军仅以炮火加以控制，阻止敌建立巩固的防御。这两个阵地按照我军的编号为537.7高地北山7号和8号阵地，是突出于北山主峰3号阵地前面的2个前哨班阵地；韩国方面则声称占领了537.7高地北山主峰A高地和“岩石棱线”。

我军将537.7高地北山阵地编为9个阵地，主峰上是2号和3号阵地，向南突出的依次排列就是7号和8号阵地，向东北方伸出的山腿上排列着4号、5号和6号阵地，主峰右侧伸出一个9号阵地。韩国方面所说的主峰A高地是指我军所说的2号和3号阵地，“岩石棱线”则是指4号、5号和6号阵地，1号阵地被其称为Y高地。韩国战史是用这样一句话为整个战斗结尾的：“第2师在‘狙击’棱线进攻战斗中，虽然未能夺取敌人的Y高地，但攻占了主峰A高地和‘岩石’棱线，向史仓里迈开了胜利的步伐。”多年以后，最后执行537.7高地北山争夺

战任务的志愿军106团团长武效贤对此颇有些愤怒：“胡说八道嘛，上甘岭这仗是我收的尾，我还知道吗？作为上甘岭战役是11月25日结束了，可我们106团跟他们28团打到12月3号才算完。主峰他想都别想，整个儿537.7高地北山，只有7、8号两个前哨阵地没放部队，我们始终用炮火控制它，其余阵地都是经我手交给29师的，他还‘胜利步伐’呢！”这就产生了一个疑问，韩国军所“占领”或者说我军丢失的阵地到底是怎么回事？

首先，我们来看看7号和8号阵地。这两个阵地位于537.7高地北山和南山相连的山梁之上，面积共约300平方米，其中南面的8号阵地距敌军前沿只有100多米。位于更高南山阵地的韩军居高临下，一个小跑就能冲上8号阵地。这种地形条件造成了这两个阵地在防守时的严重困难。当年12军指挥员提起这两个阵地就冒火，都说没有任何坚守条件，摆多少兵都是送死。就在争夺战最后一个参战团队——106团拉上北山阵地时，李德生副军长曾专门叮嘱团长武效贤，不让他在这两个阵地上放部队，只以炮火控制就行。从这个角度来说，放弃这样的阵地在军事上来说是完全合理的，只要不影响我军整体防御态势就行。据12军参战部队的记录，他们曾经也计划过反击7号和8号阵地，然后视情况坚守或撤出后继续以炮火控制，但最后在得到15军的命令后放弃了这一计划。

至于其他阵地的情况，笔者通过查阅12军参战部队的原始记录，发现该军在11月26日报兵团的情况报告中是这样描述的：“五圣山前沿之597.9阵地自本月2日31师用上后，经过4天的激烈战斗已全部守住，经二十余天的抢修工事，目前该阵地已巩固。537.7北山阵地，除7、8号阵地（东南山岭之前哨阵地）及6号阵地敌我各一半外，其余全部为我恢复。”这就是说，537.7高地北山主峰的阵地都在我军手中，而东北山腿上的6号阵地敌我各占一半。进一步查证后发现，韩军（此时已换成第9师）占据了6号阵地朝南的反斜面，后来4号和5号阵地也出现了类似情况。这应该就是韩国军所声称的占领了“岩石棱线”的真实情况。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山顶



装备精良的美军，为了对付我军的坑道而配备了大量火焰喷射器手

棱线上的工事都已经被完全摧毁，无论哪一方都无法屯兵，只好都把部队摆在反斜面上，形成一个阵地各占一半的局面。这样看来，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抗美援朝战争史》一书中，所表述的“106团牢牢控制了537.7高地北山主峰和东北山腿北侧阵地”是极为准确的。在12军于11月24日发现韩国第2师被第9师换防后召开的作战会议上，也曾估计敌军将依托7号和8号阵地与我争夺4号、5号和6号阵地，然后再攻我1号、2号、3号和9号阵地。这说明当时的战场态势是符合上面报告中所说的情况的。

但是，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当时我106团为了改变分兵把守的被动防御状态，采取了集中兵力固守2号和6号阵地的战术手段，对于其他阵地则白天主要以火力控制，夜间以小部队进行反击歼敌。这使得敌军既无法占据整个主峰阵地，也无法占据处于2号和6号阵地之间的4号和5号阵地。这一战术大大减少了伤亡，并且增加了机动兵力，但也有一个缺点，就是对主峰3号阵地的控制力度减弱了。韩军在之后的战斗中利用这一点，在某些时间段内占据过3号阵地，这可能也就成了其声称占领主峰A高地的依据。正如上面武效贤团长所说的，11月25日上甘岭战役就结束了（在战役持续时间上，交战双方都是基本一致的），但537.7高地北山的争夺

战仍然继续到12月3日。但无论此时3号阵地是在谁手里，都不属于上甘岭战役的范围了，当然也就超出了本文的范围。这片浸透了志愿军战士鲜血的高地，包括给我军造成重大伤亡的注字洞南山、537.7高地南山阵地，最终于1953年夏季金城战役中全部为我军占领。

笔者的这篇短文只是上甘岭战役全局中很少的几个侧面。从这些侧面我们可以感受到当年志愿军为了国家利益英勇奋战的壮烈情怀，以及对我国国际影响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我们今天的每个中国人都在享受着上甘岭战役乃至整个抗美援朝战争所带来的“战争红利”。当然，这并不是说国家利益非要通过战争手段来实现，但在当时是否打仗却不是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一个独立的大国要想取得相应的国际地位，不打几个硬仗、不付出血的代价是完全不可能的，那种以现在的人文意识评判历史事件的方式无疑是不合时宜甚至是幼稚的。让我们向60多年前战斗在上甘岭阵地上，乃至整个朝鲜战场上的任何一位志愿军战士（包括那些战至力竭被俘但没有背叛祖国的战士）致敬。

（全文完）

（编辑/弓鸣）